

# 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

马志刚

## 新观察

国家统计局首次披露的基尼系数显示,我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最高的0.491逐步回落,2012年为0.474。这些数据及变化,反映了居民收入分配渐趋平等态势,同时也凸显了当前缩小收入差距、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紧迫性。

基尼系数测算的是全国居民收入差异情况,此次“统计局版”基尼系数区间大约在0.47至0.49之间,足以表明我们的收入差距还很大。根据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仍高达3倍,高收入行业与低收入行业之间仍有4倍以上的距离。

当前消费市场上的一些“分化”现象,也生动地反映了收入差距的这一现状,并警示我们缩小差距刻不容缓。一方面,中国消费者是全世界头号奢侈品买主,贝恩公司前不久发布的报告就显示,全球25%的奢侈品被我国消费者买走了;另一方面,消费潜力最大的中低收入者受制于收入预期和保障水平,不敢消费也不愿扩大消费。如果收入差距状况长期难以改观,不仅我们寄予厚望的国内消费无法启动,形成发展新方式目标会落空,而且还会引发人民群众不满情绪。从世界发展史上看,一些国家之所以在经济腾飞之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差距过大密切相关。

缩小收入差距,一手要抓科学发展,把“蛋糕”做得更大,另一手还要狠抓收入分配,把“蛋糕”分得更好。从现在的情况

看,“另一手”比以往更重、更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我们的GDP“蛋糕”已算是“巨无霸”,但分“蛋糕”的改革却明显滞后,并反过来成为“蛋糕”进一步做大的新障碍。突出表现为,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有专家统计,2011年全国从业人员总收入仅占GDP的33%;二次分配中再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灰色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企业效益大降,高管薪酬大涨”等怪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大量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因素仍在“大行其道”,比如行政性垄断等,造成了市场竞争不公平,加剧了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是直接关系老百姓“钱袋子”的大事。“钱袋子”越鼓,人们生活越有保障;财富分得越公,人们越能心平气和。

如今,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分配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令人欣喜的是,2012年以来,一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接力赛”在各地展开,收入分配“提低”进程加速。国家统计局公布基尼系数,不回避问题,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一步。但眼下更重要的在于采取扎扎实实的措施,尽快在收入分配整体方案上拿定主意,而非“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3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联想起党的十八大关于“两个翻番”和“两个同步”的部署,以及近来各地区各部门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种种新动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后富”愿景不会让人们“候”太久。

## 热点透析

### 结构调整带来就业格局变化

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表示,从去年以及近年来的就业情况看,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实际上已经带来了就业格局的明显变化。

点评: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就业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派生需求,就业弹性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速,还取决于经济结构以及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适配程度等多种因素。

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更优化,客观上有利于增强就业弹性,使同样的经济增速拉动更多的就业;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会创造大量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岗位;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同样也有利于拉动就业增长,提高就业质量。尤其是服务业,在扩就业中有着特殊地位,可以成为就业最大的容器。与传统制造业相比,每一个单位的GDP产出服务业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在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扩大就业,就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点,充分释放服务业所蕴含的巨大就业潜力,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增加就业数量,提高就业质量。(吴锋)

### 破解城镇化效率低下难题

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指出,在城市化的问题上,现在有两个效率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就是城市化本身的效率不高,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城市化,所建立起来的城市运营效率很低。

点评:当前,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城镇化,从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到地级、县级城市,都在建造大马路、大广场、大建筑,但不少地方采取“摊大饼”的方式推进城市化,把各种产业都堆在大城市里面,搞“造城运动”。有专家指出,这种“摊大饼”式推进城市化,不仅导致宝贵土地资源大量浪费,而且使城市的专业化水平很低,城市运营效率低下。

我们知道,城镇化水平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人口达到80%至90%的比率。但这种城镇人口比率是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产物,是随着社会进步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不是人为地去提高城镇化比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仍将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但在城镇化建设上要遵循客观规律,要与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相适应,循序渐进;不能人为“造城”,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从而有效破解城镇化效率低下难题。(欧阳优)

### 优化环境比资金支持更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赵昌文提出,对于当前企业所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目前最重要的并不是直接给予企业多少的资金支持,而是进一步完善企业发展体制、制度和商业环境,同时提供必要的政策指导和帮助。

点评:“优化环境比资金支持更重要”这个观点道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真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有困难了,或者市场出了问题了,政府该做什么?是大包大揽还是通过优化环境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如果二选一,那应该是后者。

一般来说,企业的行为完全取决于其所在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会决定什么样的企业行为。对于当前企业所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们应进一步完善企业发展体制、制度和商业环境,同时提供必要的政策指导和帮助。当前优化环境,一是创造有利于企业形成稳定预期和长期行为的政策环境。政府的政策既要有应对当前问题的短期政策,更要有一直坚持并保持稳定的长期政策,更不能因为短期应急的需要忽视、甚至背离长期的政策目标。二是创造有利于公平竞争、公正透明的商业环境,包括法制建设。加强对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力度,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导向,切实破除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限制。三是创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特别是针对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吕志)

# 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

## ——制造业要素生产率趋势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 吕薇

## 前瞻

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用较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分析制造业的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情况,并按照国际标准,对制造业进行了分类比较研究,为制造业如何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供依据

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约40%。转变制造业的发展方式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内涵就是用较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产出,要素利用效率是衡量指标之一。我们以提高制造业增长质量和效率为目标,建立要素生产率指标体系,分析制造业的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情况,并按照国际标准,对制造业进行分类比较研究,为制造业如何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供依据。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随着要素成本的快速增加,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人口红利下降,经济增速进入缓行期,高投入、高能耗、低成本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用较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

### 制造业要素生产率变化

一是低技术制造业的要素生产率“两高一低”。低技术制造业以纺织、服装鞋帽、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人均固定资产占有率低,中小企业多。与其他行业相比,低技术制造业的资产增加值

率和产值增加值率最高,劳动增加值率最低。其中随着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各种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低技术制造业企业通过加强技术改造,用自动化设备等替代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尚不能弥补要素成本的增加。动态看,低技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值增加值率的增长低于工业平均水平,分别为13.5%和-1.64%;资金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增加高于工业平均水平,分别为5.71%和12.67%。

二是高技术制造业的要素生产率“一高一低”。高技术行业以电子信息、医药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为主,应具有高附加值和低能耗的特点,但因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主要处于低端加工制造,特别是电子信息产品以出口加工和贴牌生产为主,具有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行业的特点。因此,高技术制造业能源消耗增加值率较高,但产值增加值率较低,不仅低于先进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还低于国内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业。动态来看,高技术制造业的要素生产率增长不快。

三是中低技术制造业“一高两低”,亟待结构调整。中低技术制造业主要是钢铁、建材、石油化学等重化工业,是资金密集型和高能耗行业,以国内市场为主,人均固定资产占有率较高,规模效益比较明显,虽然劳动增加值率较高,但资产增加值率和能源消耗增加值率较低。

四是中高技术制造业处于成长和转型阶段,要素生产率上升空间较大。中高技术制造业大都是装备制造业,属于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主要靠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国产化发展起来,处于中低端制造,面临激烈国际竞争,其要素生产率并不高。近些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各行业技术升级和技术改造加快,对装备制造业的需求增加。装备制造业产品档次逐步提高,技术不断升级,提高了要素生产率和竞争力。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各项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高于工业平均水平。

### 影响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要素价格、政策环境和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要素生产率变化。

第一,改革开放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动力。1979年以来,我国各种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趋势是:劳动对GDP增长贡献逐步下降;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有高低;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波动较大。其中,改革开放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大。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综合要素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后来逐步下降。2000年我国加入WTO后,综合要素生产率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长。由此可见,改革开放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第二,市场价格体现了要素供求关系,是促进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重要因素。一是制造业的劳动工资增长较快,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增长较慢,从而促进企业加快用设备投资替代劳动。2003年至2009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指数为211.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120.22,各行业通过增加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均固定资产占有率均有较大幅度提高。二是投入品价格增长快于产出品的增长,2003年至2009年,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为135.9,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为119.54,由于产品升级和管理未跟上,导致产值增加值率下降。

第三,管理水平对要素生产率也有较大影响。从总体来看,人工和资源价格、环境保护成本等综合成本快速上升,而因管理落后和产业升级滞后,尽管劳动生产率提高,但综合要素生产率下降。

### 提高要素生产率助推产业升级

综上所述,随着要素成本的增加,我国的低成本制造优势正在减弱;随着外需增长放

缓 and 国内经济进入缓行期,产能过剩的问题显现出来,资金利用效率下降。制造业不能再靠投资拉动和规模扩展,要尽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靠资源消耗转向提高要素生产率,从依靠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依靠外延扩张转向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重塑竞争优势。

一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力培训,优化教育结构,培养大批具有高技能和高素质的一线劳动者和管理者。

二要加强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品牌培育和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和自主研发,提升产业链的价值,提高产值增加值率。

三要通过技术改造促进企业集约增长。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要从简单扩大规模向节能减排和提高效率转变,促进劳动生产率,推进节能减排,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四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政策体系,减少投资导向激励,以有序竞争的市场机制倒逼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实现竞争优势的升级。

与此同时,各行业应根据各自特点,突出转型重点。低技术制造业要改变目前低端加工和贴牌生产的状况。一方面,要培育自主品牌,加强技术改造、创新和管理,提高产品档次和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提升劳动生产率。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中低技术制造业亟待转变依靠投资扩张的传统路子,应加强技术改造、创新,提高产品档次;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和加强管理等多种方式,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特别要注意提高资金和能源利用效率。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中高技术制造业要进一步改造升级,提高产品档次和改进管理,进一步加快提高各种要素生产率,以满足国内装备技术升级的需要。高技术产业亟待改变目前靠出口加工和贴牌生产的模式,要依靠发展自主品牌和创新,提升产业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综合要素生产率,增强产业竞争力,使我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真正“高”起来。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 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将开启

综合判断国内外经济形势,今年将会开启新一轮上升周期。

从外部环境看,首先看欧洲,2012年前三季度,欧元区的17个国家大多是负增长,处在衰退边缘;欧元区以外的12个国家,以英国为代表,三季度英国增长-0.07%,总体来讲很弱。即便这样,2012年欧元区经济还是比较乐观。与此同时,德国是欧洲经济火车头,不会轻易放弃欧元区其他国家。因此,对欧元区经济还应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再看美国,美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前三季度是2.49%,全年预计是2%至2.3%的增长,美国经济增长未来还将保持良好态势。

从国内环境看,一是消费需求变旺。2012年第四季度,城市居民收入增长9.6%至9.8%,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大概在12%,这两个指标意味着2013年消费能力将呈增强之势。二是居民消费结构改变,持续性消费增加,带来消费水平的提升;三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网购模式也会对消费需求产生巨大影响。今后有可能由出口带动投资向消费带动投资进行转换。综合国内外因素,可以预计,到2020年,

中国经济将实现年均8%左右的增长,这并不等于无波动变化,实现方式上仍将以期波动的方式展开。根据以往的周期波动规律来看,2013年将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

新一轮的上升需要新动力。第一个动力是新城镇化。城市发展升级一是人口的城市化,这是量的升级,目前量的升级还处于加速期。新城镇化,除了量的升级,还有质的升级。包括四方面:一是设施现代化,包括交通设施信息化,交通设施的便利化;二是城市数字化、智能化,只有全面数字化才能达到智能化;三是城市的生态化、绿色化;四是城市福利的社会化。第二个动力是居民消费升级,产业发展的升级。一是私人消费品、家电耐用消费品向节能化、智能化发展,家电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军工、国防产品的制造,带动整个产业的繁荣。第三个动力是区域经济发展。

对于政府在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的作用,不应再出现大的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GDP增长的情况,政府只应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保持宏观政策的相对稳定。

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

## 未来中国农村会是什么样?

中国农村经济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远来看,中国农村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将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村将呈现出更多的功能性。

一是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将发生逆转,从“半截子”产业化向全产业化转变。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常有发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缺陷,“公司+农户”这种产业化模式成为小生产大市场的生产方式选择。但这种产业化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具体来说,农产品特有的“盲点商品”属性,即从外观很难看出质量高低,导致公司与农户之间缺乏信任,公司一般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原材料,而没有谈判力的农民为了多赚钱只能以量取胜。因此,这种“半截子”产业化难以满足对食品安全日益高涨的城市居民。未来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方面从“公

司+农户”向全产业化转化,公司通过内部化生产、品牌塑造来提升质量;另一方面,将农民联合起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进行规模生产,直接与用户对接。

二是将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农村,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会大幅度攀升。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的统计数字是51.27%,但这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也就是说,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口径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7亿人中,有大约2.2亿人仍然持有的是农村户籍,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镇户籍人口所能够享受到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这说明我国的城镇化的质量不高,统计数据所反映出的城市化水平是内涵不够充实的和基础不牢固的。因此,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必须大力促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

三是农村不再是单纯从事农业生产与农民居住的地方,未来中国农村将会增加多功能性,成为城市居民旅游、度假、观光之地。

